

东吴名家·王尧

在文体与文章之间：理解王尧写作的一种方式

臧 晴

摘要：王尧的学术研究、文学批评、作家对谈、口述史、散文与小说，构成了跨越现代知识分类的多重实践。他不以“跨文体”自居，而将这些实践置于中国“文章”传统中理解。其文章观并不取消具体文体，而是强调知识须转化为个人判断，经验须获得与之相称的语言，写作者须对二者的结合承担责任。早年的散文研究使他重新发现现代文体与文章传统之间的联系，论文、散文、对谈与口述史之间的迁移，则分别生成关系性、位置性、对话性与分布式的历史知识。进入小说创作后，文体问题进一步转化为材料、结构与真实性的纪律。王尧写作的意义不在于多重身份的叠加，而在于持续将文体作为认识历史、安置经验和校正写作者自身位置的实践来处理。

关键词：王尧；文章传统；文体实践；历史知识；写作者

王尧的写作横跨学术研究、文学批评、作家对谈、口述史、散文和小说。按照今天的知识分类，几乎处处涉及文体与边界，但他本人却更愿意把写作放回“文章”的传统中理解。他说：“我是一个写作者，尽管涉及到不同的文体，但在‘文章’的传统里，我不认为自己是‘跨文体’写作，用不同的文体表达思想情感是汉语写作的传统。”^①从“文体”到“文章”，改变的不只是称谓。现代文体制度依据表达方式划分疆域，“文章”则保留另一种整体性：知识、思想、经验、性情与语言，可以在同一个写作者那里彼此贯通。

所谓“文章”，指向一种写作的内在秩序：知识经过个人判断，经验获得与之相称的语言，

写作者对二者的结合承担责任。文体回答一段文字以何种形式成立，“文章”意识则追问这段文字如何成为写作者自己的认识。前者划分论文、散文、对谈、口述史与小说的基本规则，后者使思想、性情和语言在专业分工中仍能保持联系。王尧在二者之间的往返，不只表现为写作领域的不断扩大，也包含着对知识如何形成、历史如何进入文字，以及写作者如何确立自身位置的持续思考。

① 罗昕：《专访 | 王尧：在写作中安放自己，探寻来路》，“澎湃新闻”，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99687，2021年5月31日。

—

王尧的文章观并非在“跨文体写作”成为热门话题之后突然形成,而是早已潜伏在其散文研究中。《中国当代散文史》着重梳理散文的历史秩序,《乡关何处——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将文体放入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询问美文: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经典书话》则借书话进入作品、阅读和个人判断。研究对象仍是散文,问题却从一种文体的历史,逐渐延伸到思想怎样落实为文字、知识分子怎样建立自己的表达方式。^①散文为这一思考提供了特殊的入口。传统的“文章”原本包括论辨、序跋、书说、传状、碑志、杂记等多种体式,也同时承担说理、记事、抒情、交往和经世等功能。现代文学制度建立以后,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获得相对独立的文类身份,广义文章中具有审美价值的一部分被重新命名为文学。散文在这一过程中既获得了现代文体的独立性,也始终保留着旧有文章的复杂遗传:它与书信、日记、序跋、游记、杂说和笔记相邻,形式边界远比其他文类松动。王尧后来将这一变化概括为散文内部的“裁员”:一些旧有体式或独立门户,或流离失所,现代散文则在不断缩小又不断扩展的范围中确认自身。

《询问美文: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经典书话》处在这一认识逐渐清晰的节点上。它没有依照通常的文学史体例排列作家和思潮,而是通过书话展开阅读,知识、评议和个人感受共同进入论述。王尧后来回顾这本书,称它是自己“表达方式有所自觉的开始”“我试图让论文接近文章传统”。^②这里的“接近”,落实在论述方式的变化上:结论仍需材料和分析支持,研究过程却不必隐藏;阅读者怎样产生疑问,怎样接近一篇作品,又怎样在对象面前修正自己的判断,也可以成为文字的一部分。论文由此不只交付结果,还呈现思想发生的路径。

除散文研究外,当代文学史与思想文化,也是王尧长期着力的主要领域。研究对象不断扩展,早年形成的文体敏感并未中断;对语言与写作主体关系的追问,反而在这些研究中变得更加尖锐。在讨论特定时期文学对“五四”及现代文

艺的叙述时,他回忆一代人的语言经验称:“我们是在复制语言的环境中学习写作与言语的。”^③语言在这里直接参与主体的生产:现成的句式预设了立场,固定的概念组织了经验,写作者也可能在熟练使用公共话语时失去自己的判断。

王尧对“非知识分子写作”、主流话语生产以及知识分子身份转换的考察,包含一条隐蔽的文体线索。写作主体的存在,并不取决于文中出现多少次“我”,而在于作者能否独立辨认材料、形成判断,并对使用的语言负责。一篇文章可以保持克制的客观声调,仍然显现作者的思想位置;第一人称也可能只是现成观念的重复。文体在此已经超出形式特征,进入思想如何成为个人思想的问题。

王尧的学术转向发生在中国人文学术专业化加速的时期。现代学科体制建立对象、方法和规范,研究者由通人趋向专家,论文也逐渐形成稳定的生产程序。这一变化有其历史必要。陈平原回顾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转向时,更认同王元化所提倡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并提醒人们,80年代的思想活力中也夹杂着大而化之与任意发挥,90年代向学问和规范的转移同时包含主动调整。这番辨析也适用于理解王尧的文章观。它生长于现代学术制度内部,接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清楚史料、论证和学术边界的价值。

问题出现在专业能力逐渐被等同于单一表达方式之后。王尧曾用树枝比喻学科训练:“我们熟悉的学科体制内的训练,粗糙地说是删剪与专业无关的枝叶,在一根树枝上结出果实。”^④专业化使知识持续向纵深发展,也可能将与研究对象相关的语言感受、现实经验和文化判断留在学术之外。文学研究者能够细密分

① 王尧:《中国当代散文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王尧:《乡关何处——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王尧:《询问美文: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经典书话》,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

②④ 王尧:《我只想做一个写作者》,《小说评论》2022年第3期。

③ 王尧:《“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析作家的修辞、节奏和声调,自己的文字却日渐趋同;能够说明文学怎样构成一种认识,论文自身却被简化为概念和材料的运输工具。王尧对“文章”传统的重提,回应的正是这一具体处境。

王尧所接续的并非一个保存完好的古典文章整体,而是一个经过现代文学和现代学术重新解释的传统。吴承学梳理中国文体学的百年历程时指出,其实质是传统文体学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新文化在解构传统的同时,也参与了新的建构,今天的文体研究则是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对传统作更高层次的回归。^①王尧同样强调,作为“传统”的文章学也是现代人的发现,其中包含历代资源在现代语境中的创造性阐释。这意味着,古代文章观念只能作为需要转化的资源进入当下。传统文论中的“文与道”“文与气”“文与情”等范畴,无法直接替代现代学术方法,却可以重新提出被专业分工遮蔽的问题:思想与表达的关系,主体与语言的联系,经验与修辞的诚实。证据、逻辑和学术规范保证知识的可靠性,文章意识则要求知识形成个人判断,并找到准确、有效的汉语表达。二者共同构成现代学者的写作条件。

由此,王尧的文章观获得了较为明确的历史内容。它既来自现代散文与古代文章之间未曾完全中断的联系,也来自专业化知识生产内部的自我反省。文章传统在这里承担的任务,是使现代学术已经获得的专业能力进一步转化为写作能力:研究者不仅要提出可信的结论,还要在语言中呈现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

二

王尧研究当代文学,常常从已经成形的文学史结论往回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命名,使纷杂的文学现象获得秩序,也容易让后来者把结果误认为过程。在《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以“先锋”与“寻根”等文学话语的缠绕为线索》《“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等文章中,他不断拆开这些概念,追索不同思潮之间的交叠、文学话语与社会文化的纠缠,以及作品、刊物、批评和

文学活动共同参与历史形成的过程。^②这些论文生产的是一种关系性的历史知识。它们把作品放回概念、制度和话语相互作用的结构中,考察一种文学现象如何发生,后来又如何被命名和经典化。“寻根”与“先锋”在文学史教材中往往依次出现,在实际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现场中却有时间上的重叠,也共享对文学形式和文化意识的重新思考。研究的任务,是通过史料和论证揭示这些关联,修正线性叙述制造的整齐秩序。

散文所改变的,首先是研究者的位置。在《沧海文心》《日常的弦歌》《时代与肖像》等系列中,王尧写战时重庆、西南联大和个人成长经验。迁徙、课堂、饮食、书信、疾病与家庭关系不再只是重大思想事件的背景,它们构成知识分子实际生活的世界。王尧认为:“如果说文学史研究是和历史的一次对话,这类散文写作则是将自己的身心安放到历史之中。”^③“身心”进入历史,意味着研究者不再以无位置的目光观看对象。他需要说明自己为何被某个人物吸引,怎样通过当下经验理解逝去的生活,以及这种接近可能带来怎样的偏爱。

散文由此形成一种位置性的知识。它呈现公共历史如何作用于人的身体、性格和日常关系,也显露叙述者观察历史的具体立足点。一个知识分子的选择固然可以由政治环境、思想资源和制度结构解释,但散文还会触及他在某个时刻的迟疑、依恋和生活习惯。这些内容没有被提升为普遍因果,却使历史重新拥有人的尺度。与之相应,作者的感情也必须接受材料的制约;散文中的“我”提供一种视角,而不是对人物内心的无限通行权。

① 吴承学:《中国文体学研究的百年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② 王尧:《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以“先锋”与“寻根”等文学话语的缠绕为线索》,《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王尧:《“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

③ 王尧:《我只想做一个写作者》,《小说评论》2022年第3期。

作家对谈改变的则是观点产生的方式。2001年前后,王尧参与策划“小说家讲坛”,此后主编“新人文对话录”丛书,与莫言、韩少功、李锐等作家持续对话。他曾说:“在我看来,了解和理解作家是文学批评的前提之一,而对话则是了解和理解作家的方式之一。”^①对谈所得并非一批等待记录的现成观点。问题改变了回答的方向,回答又可能迫使提问者放弃原来的预设;作家在讲述创作经验时,会临时寻找词语,也会犹疑、修正和自我辩护。由此,思想在问答关系中获得表述,知识因而带有鲜明的生成性。

相较而言,批评文章通常以完成的形态出现,读者看到的是作者组织后的论点,对谈则保留了理解尚未封闭的时刻,问题如何触发记忆,一段回答怎样偏离原来的话题,双方如何在不完全一致中继续交谈。作家的自我阐释当然不能代替作品,批评家的提问也绝非中性的工具。正是这些可见的差异,使对谈成为一种有别于论文的批评知识,它记录的既是“说了什么”,也是观点如何在具体关系中被说出来。

口述史改变了文学史的讲述主体和对象范围。《“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将编辑、出版人、批评家、文学活动组织者和文艺机构工作者纳入叙述。文学史由此不再只由作品、作家和思潮构成,一部作品如何通过编辑部,一种命名如何在会议、刊物和批评中确立,文学制度和人际网络怎样影响创作,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口述史提供的是一种分布式的知识:历史散布在不同参与者的经验里,需要通过彼此有差异的讲述逐渐显形。保尔·汤普逊(Paul Thompson)指出:“在历史阐释的发展过程中,能够把各个彼此孤立的生活领域联系起来的能力是口述史天生的力量。”^②同一文学事件由作家、编辑和批评家分别讲述,原先分离的创作、发表与评价过程便重新接合;几位亲历者对同一件往事的差异,也使文学史不再轻易收束成唯一版本。

这种扩展改变了历史书写的权力关系。王尧在《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一文中,把“历史由谁讲述”列为口述史的基本问题,并指出文学口述史可能改变历史书写者与被书写者之间的关系。这里的“改变”并不意味着访问者退出。访问对象的选择、问题的设置、

材料的删节、次序的安排和注释的撰写,仍然体现编者的判断。口述史只是使这种判断不再隐身于全知叙述之后,读者能够看到历史由声音转换为文字的过程。

记忆的偏差也属于这一知识形态的内部。口述者会遗忘,会根据后来的经历重新理解往事,在不同场合也可能给出不同版本。王尧特别注意到,声音转为文字时,语气、迟疑、停顿和身体语言会大量流失,采访者对材料的塑造也无法完全消除。口述史的价值因此不只在于提供更多“事实”,还在于把记忆、遗忘和讲述处境一并变成需要解释的对象。

从散文到对谈,再到口述史,三种写作形成了清晰的递进:散文显露认识者身处何处,对谈呈现观点如何在关系中发生,口述史则重新配置文学史的讲述主体和对象结构。它们没有共同充当论文的“细节补充”,而是在不同层面上改变了历史知识的生产条件。王尧从论述历史走向叙述历史,真正发生变化的,正是认识者、讲述关系与历史结构。然而,当这些方式被放置在一起,文体之间的边界如何维持,又如何在越过之后获得新的成立理由?这正是多种写作同时面对的核心难题。

三

多种写作方式并置后,问题不再是边界能否跨越,而是每一种形式承担怎样的真实性要求。研究需要建立可复核的材料链条,散文需要说明个人经验介入对象的位置,对谈要保留问答发生的关系,口述史必须交代声音转写、剪裁和编排的过程,小说则要让材料转化为人物命运和叙事结构。文体纪律由这些不同的责任构成。王尧对此保持相当谨慎的态度:“跨界之后,能否产生新的文体则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时间来回答。曾经的跨文体写作,确实产生了一些新

① 舒晋瑜:《王尧:当代小说需要“革命”》,《中华读书报》2021年7月28日。

② [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等译,第316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

的因素,但迄今未形成新的文体。”^①这句话把文体实验从简单的形式混合中区分出来。一部作品容纳档案、日记、论文或口述,并不会自动获得新的认识能力。材料进入另一种文体,必须改变原有的存在方式:档案不能只用来显示作者知识渊博,真实人物也不能只承担某个思想命题;它们需要进入作品的节奏、关系和结构,成为不可替换的部分。文体的开放增加了作者需要处理的关系,也提高了作品成立的难度。

杨晓帆曾将王尧的多种写作理解为一种主动的自我扰动:“被称作跨界、跨文体的写作,其实是用‘跨’的方式打乱自己所熟悉、依赖的种种话语,以更新语言的方式更新自我,更新文学。”^②这里也涉及王尧所说的“写作者”究竟意味着什么。所谓完整的写作者,是多种能力在同一个主体内部形成有张力的统一:学术训练提供材料意识和历史判断,文学经验保存对语言、人物和感受的敏锐,批评则不断检验写作的尺度。这些能力彼此借力,也彼此校正。完整并非身份数量的增加,而是写作者不会被其中任何一种能力完全规定。

《民谣》可以作为一则旁证。小说把旧作文、代写稿件、书信和注释收入“杂篇”,保存了一个乡村少年学习公共语言的真实痕迹。王尧写道:“这些作文和写在信纸本上的稿子,留下一个乡村少年到青年的思想发育痕迹和尘埃。”^③它们原本曾被设想以非虚构方式发表,后来才被收入小说。随着考证难以恢复记忆深处的细节,写作转向“我在记忆中去虚构,在虚构中去记忆”^④。这些材料在小说中承担的任务,是呈现一代人的语言教育如何进入个人成长,而非为虚构增添事实证明。《桃花坞》则显示了另一种取舍。《民谣》的“外篇”和“杂篇”内在于作品对当时“语言生活”的理解;《桃花坞》初稿也曾设置四篇“札记”,最终全部删去,“想让文本朴素一些,不影响读者的阅读”^⑤。他说:“如果没有内在性,所有的探索都是勉强的。”^⑥同一种结构没有被沿用为稳定的作者标识,说明文体选择受制于作品所理解的生活。《民谣》需要把语言遗迹推到前景,《桃花坞》则让知识和史料沉入人物关系与日常叙事。

这两部小说也显露出知识分子写作可能遭

遇的压力。丰富的知识容易形成解释生活的冲动,史料可能成为展示对象,批评意识也可能抢在人物之前概括意义。一个能够调动多种资源的作者,尤其需要给人物、材料和他者经验留下抵抗自己的余地。作品的世界一旦完全服从作者已有的历史观和价值判断,多重能力反而会汇集成一种更强的控制。

由此,“写作者”的理想也有其限度。它可以抵抗现代分工造成的单一身份,却不能成为一种关于自我圆满的神话。研究者、批评家和小说家的经验集中于一人,并不保证作品天然完整;它们可能相互激发,也可能彼此干扰。真正的检验在于,新的对象能否改变作者原有的语言,人物能否逸出作者预设的意义,材料能否迫使写作者承认自己尚未理解的部分。写作能力最终表现为接受对象修正的能力。

王尧的意义未必在于同时拥有几种身份,而在于他把文体始终作为一个问题:写什么,同时意味着凭什么写、由谁来写,以及怎样的文字才配得上这段经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在某一句文体主张中,而在一次次具体选择里——有时改变原有的写法,有时让他人的声音进入历史,有时删去已经熟练的形式。一个写作者最终留下的,除了作品,也包括这些选择所形成的分寸。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研究”(22CZW04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臧晴,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江苏首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思潮、海外汉学、性别研究。著有《风格的图谱》《当代女性文学个人话语研究》等。

① 王尧:《跨界、跨文体与文学性重建》,《文艺争鸣》2021年第10期。

② 杨晓帆:《书外春秋与自题小像——写作者王尧的“自我”批判》,《小说评论》2022年第3期。

③④ 王尧:《民谣》,第26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

⑤⑥ 王尧、臧晴:《他们是真实的,我自己是虚构的——〈桃花坞〉访谈》,《当代作家评论》2026年第2期。